

※ 採訪報導 ※

王陽明第十六世孫王詩棠先生訪談錄 ——兼論紹興陽明世家及遺存

錢 明*

陽明學研究數百年來歷久不衰，但陽明先生是否還有後裔存於世，則始終是學術界感興趣的問題之一。

一九九八年四月三日，浙江大學百年華誕，海內外同慶。其間有一浙江大學學子世家的存在引起了省市新聞單位的濃厚興趣，四月三日的《杭州日報》和四月二十六日的《浙江日報》分別作了報導。報導中，該家族的長輩已八十二高齡的王詩棠先生（退休前為浙江省財政廳財政經濟師），首次向新聞界披露了自己係王陽明第十六代傳人這一鮮為人知的歷史史實。五月初，浙江電視臺國際部聞訊又作了專題採訪，並製成「陽明傳人」的專題片。我們先是從王老次子王書翔的電話裏得知這一消息的，但當時並沒有引起我們的多大關注。因為多年來自稱是王陽明後裔的信函和電話我們已收到過不少，可是不是言無實據，就是離譜甚遠，叫人難以確信。

去年底，為籌備「紀念王陽明逝世四百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受大會籌委會的委託，我特地四赴王老府上採訪。說來也巧，王老就住在我的舊居杭州市馬塍路三十號三一三室的正北二樓，十餘年來，進進出出，竟失之交臂。王老雖患眼疾，但記憶驚人，頗為健談，不僅向我講述了自其懂事後耳聞目睹的有關陽明後裔、王氏故居、祖塋狀況及家譜神像等方面大量真實可信的一段段往事，而且還將自己花了半年多心血記述下來的《王陽明世系在紹興》贈予我。於是，我便根據王老的記述和回憶以及自己所掌握的有關文獻資料，以問答和案語的形式整理了這篇訪談錄，供學術界及關心這一問題的人士參考。

*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錢問：王老，我想先冒昧地問一句，您從小就曉得自己是王陽明的第十六世孫，那為何至今才向世人披露？

王答：陽明後裔到清康熙年間漸趨衰微，族中已無讀書之人，大多以商賈為業、傭工為生。而我自幼酷愛讀書，雖家境不允，又遇抗戰時期，但仍設法讀完了稽山高商（即紹興第三高商），這當中還插讀過私塾和英文學校。一九四一年高商畢業前夕，紹興即將淪陷，我隨學校內遷，畢業後考取財政部稅務總署，後分配到江西工作。抗戰勝利後回浙江，一九五〇年調至浙江省財政廳，直至一九八六年退休（後又被留任）。因屬「舊社會留用人員」，且長期在財稅這一重要崗位工作，故一直謹小慎微，少說多做，對身世、家世忌諱不談，對解放後被視為「鎮壓農民運動劊子手」、「主觀唯心主義者」的先祖文成公更是三緘其口。「文革」以後，子女們曾多次提出要披露這一史實，但由於自己心有餘悸，加之工作繁忙，故一拖再拖，直到一九九六年離開財稅部門回家養老後，才覺時機已到，方一吐為快。

錢案：解放後王詩棠工作兢兢業業，在財務部門人稱「鐵算盤」。教子致志讀書，以「勤讀傳家」而著稱；且常以先祖文成公之精神激勵後代。子孫中大學以上學歷者有十八人之多，僅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就有四人。長子王書鴻係我國著名高能物理學家。其家族的興盛，實乃對九泉之下陽明先生的最好告慰。

錢問：據我所知，一九八四年餘姚文管會的葉樹望曾採訪過一個叫王詩彥的老農，當時王已七十三歲，住在蘭亭鄉花街村，亦稱自己是王陽明的第十六世孫。另外我最近又從紹興有關方面得知，現住紹興上大路王衙弄（過去叫黃衙弄）的王百年老人（七十六歲），亦稱其父王詩君（君字為諧音）為陽明之後裔。不知您是否熟悉？他們與您是何關係？陽明後裔的輩份世系是怎樣排列的？如今您知道的還有哪些人？

王答：王詩彥是我的堂兄，已去世十來年了，屬狗，我叫他阿狗哥哥，解放前也住在伯府，讀過幾年私塾，解放後就再沒見過他，據說因屬「四類分子」，被整得夠嗆，也許正因為此，被「下放」到了花街務農。王詩君我沒聽說過。山陰王氏的輩份世系，共四十字，家譜裏記得很清楚。因家譜「文革」中被毀，現已無從查考，我只記得前二十字：「守正承先業，貽謀裕後昆；忠孝傳家遠，詩書紹澤長。」最近餘姚諸煥燦先生又為我補充了後二十字：「功德千秋在，淵源百世宗；熙朝舒泰運，心學誦前芬。」^①山陰王氏各房都有堂名，我家堂名為「德逸堂」。德逸堂

① 據我了解，諸氏資料來源於《姚江開元王氏宗譜》光緒二十九年存本堂刻本。

從「忠」字輩起各代列祖的諱名是：忠信、孝瑞、傳奎、家榮、遠銘。我爺爺王家榮生有六子，父親王遠銘是其第五子。爺爺不識字，以釀酒開店為生。六子中僅大伯、二伯讀過一點書。聽父親說，二伯曾見過從餘姚來越城投親認族的文成公第十六世孫王造周（關於王造周的情況後面再談）。父親從小當學徒，後來開了車行，專門修理和出租人力車，家境漸好。父親生了我和弟弟詩華（已故）。我能從小讀點書，全靠母親的支持。外祖父是醫生，故母親有點文化，我從小受母親的影響極大。我現有二子三孫。在我的印象中，文成公之弟守文的第十世孫王忠立死後，其子「阿興家長」就成了一族之長。阿興是個斗字不識的貧苦佃農，山陰王氏的祭祖活動全由他主持。此時我家「德逸堂」這一系已到了「家」字輩，輩份小，自然事事都得聽人家的。我小的時候，住在伯府的文成公後裔中，有三個人的地位較為突出，這三人都是「遠」字輩，人稱「侍奉生」，即伯府的對外事宜，皆由他們三人接待侍奉。因他們識幾個字，有點錢，故伯府內的所有「外交」大權都交給了他們。於是他們便獨斷專行，賣掉了祖上傳下來的一些房產（包括伯府）。聽祖輩說，按家族的規定，凡山陰王氏的後代都有權享用海日公（即王華）和文成公所建立的家業。因文成公是長子，其後代理應有更大的決定權。為此，我父親還與侍奉生們打過「官司」。正因為此，侍奉生們都反對我讀書，擔心我讀了書後會威脅他們的地位和權利。侍奉生的後代現在還有一人在杭州，叫王書銘，是杭六中的圖書老師（已退休），但他已對祖先的歷史知之甚少了。

錢案：陽明出生餘姚，自稱「紹興府餘姚縣人」^②，後又始終以餘姚為「家鄉」（頁224），故一般都稱其為「姚江王氏」，並稱其學派為「姚江學派」。然其父王華，因「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為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③之光相坊居

② 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90；以下凡引該書只注頁數。

③ 「越城」一名當時在廣義上應指包括山陰縣城和會稽縣城在內的紹興府城。山陰、會稽為鄰縣，兩縣城在一大城之中，即古山陰大城，隋唐時為越州，南宋時始改紹興之名。紹興府城的東西兩部分以城中運河為界，分別為會稽縣城和山陰縣城，後來的紹興府行政單位都在山陰城中，而陽明及其弟子所說的「越城」一般都指山陰城（亦即紹興府城）。蓋山陰乃古越之地，後越州府城又在此，故有此稱，參見陳來：《有無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64-365。餘姚歷史上雖都屬越州或紹興府管轄，廣義上亦可稱其為「越」，如陽明《居越詩》即包括餘姚。但習慣上「越」是指山陰、會稽或紹興府城，故《年譜》及陽明本人在使用「越」和「姚」時都有明確指稱，未見以「越」代「姚」之例。

之」(頁1220)；而據《年譜》成化十七年載：陽明十歲「皆在越」，是年王華「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頁1221)。故有學者認為，陽明是在該年隨其父遷回山陰原籍的^④；王詩棠也主張此說^⑤。此後陽明雖五次歸姚，其中還有兩次重要的講學活動，即正德十六年九月「歸餘姚省祖塋」時舉辦「龍山之會」(頁1344；又稱「臥龍之會」，頁224)，「隨地指示良知」(頁1282)，及嘉靖四年九月「歸姚省墓」，至年底，「定會於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為期」(頁1293-1294)，會友講學。但在《年譜》裏記載陽明「至城」、「在越」、「發越」的竟有十五回之多，且有早年的「築室陽明洞」(頁1225)之舉措，又有後來的「稽山書院講習」(頁1290)之盛況，更有晚年的「天泉證道」(頁1306)之辯證。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說餘姚是陽明的出生、講學之地，龍場是陽明的「悟道」之地，江右是陽明的「過化」(頁1351，即「點化同志」，頁1236)之地，那麼紹興則可以說是陽明的成長之地(包括學術思想)。用他弟子的話來說就是：「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頁118)故陽明既自稱「餘姚王守仁」(頁1183)，又謂己「古越陽明子王守仁」(頁1198)；而其後裔則有從出生地而自稱「姚江王氏」的，也有從成長地而自稱「山陰王氏」的，更有從世家的往返遷徙過程而統稱「姚江山陰王氏」的。其實這些說法都能成立。但有一點應該肯定，即王詩棠的家世既然是從海日公開始的，故稱其為「山陰王氏」，當不為過。現在的問題是：王華有四子，並皆隨其父遷徙越城；而今家譜已遺，王詩棠僅憑祖上傳話證明自己為長子陽明一系，恐生疑慮。

錢問：剛才您提到的餘姚王造周，據傅振照、邵九華考證，係清光緒年間人。「壬辰秋(1892)，周邑侯(周炳麟，南海舉人，光緒十七年任餘姚知縣)謁文成祠，訪及後裔得十六世孫王造周，憫其孤苦，即命人署教讀。逾年從和遊，(探問)先型。但云家有遺像，殘破已甚。和出資裝裱，猶未知為誰和之像。也幸王氏

④ 參見傅振照：《王陽明哲學思想通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3年)，頁205。

⑤ 除此之外，學術界還有兩種意見：一是諸煥燦的正德十四年或十六年遷居山陰說(參見〈姚江王氏、遷居紹興、爭嗣爵位三考〉，《餘姚鄉賢論》1992年第2輯)；二是陳來的弘治十六年或十二年遷居山陰說(參見《有無之境》，頁370-371)。就此筆者曾詢問過王詩棠的看法。王堅持成化十七年說，並認為王華是為準備赴京應試，才僦租於交通便利、文化發達的越城光相仿的。

有舊存祭薄，中有元旦拜像，文與此符合。其爲文成公暨上六代遺像，信而有證。因有王氏遺像備考並交造周藏之，謹略述其源，以示來（歷）。」民間傳說王造周爲孤兒，在大餅油條店做童工。知縣周炳麟發現後，供他讀書，下任時又托付給徐葆和。成年後安家於杭州^⑥。您對這個亦被視爲王陽明十六世孫的王造周有何說法？

王答：王造周確有其人，這是我從小聽父親說的，但只聞其名，而不知「造周」二字如何寫。以前我一直用諧音「兆舟」二字代爲其名。近讀《餘姚鄉賢論》第2輯，才知當時餘姚人皆稱其爲「造周」。聽祖輩說，大約在一八九〇年前後，有個自稱是餘姚陽明後裔叫王造周（兆舟）的人來越訪親認族。當時是我二伯父王遠懷接待他的，並請他到祠堂與全族人見面。他回餘姚後與我們很少有聯繫，時間一長，也就淡忘了。按照輩份排列，我以爲「造周」很可能是「遠周」之誤筆。因爲山陰王氏輩份世系的四十字中沒有「造」字輩，此其一。其二，「造」字與繁體字的「遠」字很相近，容易筆誤。加之王造周自幼是孤兒，沒有文化，恐怕連自己姓名也不會寫，別人把他的「遠」字寫得潦草一點，就很容易誤讀成「造」字，因無人爲他更正，久而久之，便成了習慣。其三，說我「詩」字輩爲十六世孫，乃是從文成公算起的。若以海日公爲始祖一世，則十六世孫應爲「遠」字輩。在我們山陰王氏後裔中，一向有以海日公爲始祖的傳統。這樣看來，十六世孫王造周的輩分應是「遠」字輩，而「遠周」被誤寫誤讀爲「造周」在事實上也是可能的。

錢案：這一解釋很有道理，只是未說明作爲「遠」字輩的十六世孫王遠周一系是什麼時候、爲何原因從山陰遷回餘姚的？諸煥燦曾以楊博撰於隆慶二年（1568）的〈會議復爵疏〉（頁1514）爲據，認爲陽明歿後，由於胤子王正億與嗣子王正憲之間的矛盾，正億一脈又返居餘姚，成爲姚江王氏的真傳血脈，僅正憲一系仍留居在山陰^⑦。王詩棠對此說持懷疑態度。筆者細查楊文，覺得諸氏此言確有失之牽強處。究竟何人何時回遷餘姚，據此推斷，恐欠客觀。

錢問：作爲陽明後裔，據您所知祖上傳下來有那些「家傳之寶」？現在都在何處？能否回憶一下其流傳和遺失的過程？

王答：我紹興文成公後裔原有祖傳「寶物」四件：1.《姚江王氏宗譜》一部十

^⑥ 參見〈王陽明先生與後裔考略〉，載《浙江學刊》1990年第4期。

^⑦ 參見〈姚江王氏、遷居紹興、爭嗣爵位三考〉，《餘姚鄉賢論》1992年第2輯。

八冊；2.始祖海日公像一幅：烏紗帽，草綠色繡金蟒袍，腰繫玉帶；3.文成公像一幅：鋼盔冠頂，紅色繡金蟒袍，腰繫玉帶，雙手拱捧朝笏；4.西青公（陽明三弟守章）像一幅：學士打扮，烏方巾帽，藍色斜領青衫。其中文成公像聽說是我祖上傳下來的。其他三件則是由王造周從餘姚帶來送到我家的。文成公像後來由王詩彥保存。「文革」時，詩彥怕被抄家，將其扔進河裏。後聽說被一漁民撈起，因不知畫像裏的爲何人，故而並不看重。最後才輾轉到了餘姚梨洲文獻館。海日公像和西青公像，是我十三、四歲時，由伯父拿到越城小江橋九華堂裱畫店去修裱，後來就再也沒見拿回來了。至於家譜，我小時還讀過，「詩」字輩就是由我補上的。我記得很清楚，二伯父也曾作過續補。家譜原有十八本，侍奉生借去看後，不知何故，還回來時只剩十七本了。後來我出去讀書，家譜的去向就不得而知了。

錢案：據徐階〈陽明先生畫像記〉載：「嘉靖己亥（1539），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頁1524）說明陽明畫像在嘉靖年間已有多種摹本。現據筆者調查，陽明遺像至少有以下幾種：1.陽明燕居像（中國歷史博物館藏）；2.王文成公遺像碑（在餘姚龍山萬筠軒，爲陽明冠帶袍笏坐像，已被毀；一九一六年日本畫家橋本關雪訪姚時，曾據此畫臨摹，並題書〈啾啾吟〉；後該畫在東瀛流傳甚廣，安岡正篤、岡田武彥等著的陽明學著作裏都有印錄）；3.陽明石刻坐像（刻於明萬歷年間，九華山化誠寺藏，與橋本臨摹畫很相似）；4.陽明半身官服像（張陶庵《越州先賢三不朽圖像》收，明刊本已佚，今餘姚瑞雲樓藏有清嘉慶二十一年刊本）；5.新建侯文成王公小像（《四部叢刊》本《陽明全書》收，此像亦頗似橋本臨摹畫）；6.陽明封新建伯像（餘姚龍山中天閣藏。一九八七年岡田武彥訪姚，經文管部門許可，攜複製品回福岡印行，遂廣泛流傳於海內外）。據葉樹望介紹，陽明封新建伯像是「文革」中紹興人士捐贈給餘姚梨洲文獻館的，原爲陽明接受爵位時的全身跪像，文獻館在將其複製放大時，僅取了上半身（王詩棠對「跪像」說頗爲驚詫，認爲是餘姚人弄錯了）。此外，據說餘姚文管會還藏有一幀「王陽明遷姚三世祖士元公迄王文成公遺像」，筆者未見，不知其中的文成公遺像是否屬上述畫像之一種？

至於《王氏宗譜》，據諸煥燦說，陽明本系譜牒《姚江秘圖山王氏宗譜》現尚未發現，然陽明傍系如《姚江開元王氏宗譜》、《餘姚孝義官人宅王氏宗譜》等王氏譜牒，則存有多種。另據諸氏新近提交「紀念王陽明逝世四百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記述：「現在浙江省科委的王書翔同志早年曾從紹興舊居找得《姚

江秘圖山王氏宗譜》舊刻本一套，帶至杭州收藏，但在文革期間，因其父懼怕家藏古舊書遭禍而偷偷燒掉，王書翔同志至今仍後悔莫及。」王書翔係王詩棠次子。關於將宗譜藏至杭州後又毀於「文革」之事，筆者從未聽其父說過。因此，王詩棠記憶中的《姚江王氏宗譜》十八本，究竟是否《姚江秘圖山王氏宗譜》，尚難作定論。

錢問：紹興民間流傳有「呂府十三廳不及伯府一個廳」的說法。而呂府（嘉靖時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宅第）從現存的三個廳來看，其宏偉豪華之程度，令人瞠目結舌。故後人由此推斷，伯府當時應是豪華至極、恢宏無比的建築群體。您能否談談伯府的真實情況及其歷史沿革過程？

王答：據祖上傳話，「呂府十三廳不及伯府一個廳」，指的是建築材料而非建築面積。因伯府是欽賜御建，用的全是楠木，加之以爵位命名，這對當時的呂府來說，當然難望其項背。不過若以建築群而言，伯府是遠不及呂府的。兩府都是明代嘉靖年間的建築，座北朝南，前後相鄰，故有「呂府無後門，伯府無前門」之說。呂府有十個廳（不包括河對岸小呂府的三個廳），分設前後兩排，占地四十八畝，而伯府僅占地十六畝。我先祖海日公之所以要選中光相坊作為宅基地，就是因為此地係水網地帶，四通八達，素有越城腹地（諧音「福地」，較吉利）之稱。先祖徙居越城以後的宅第建築共有三處六所，歷時四十餘年，都在東西兩光相坊。一處是光相橋東側即東光相坊的「宮保第」和「王氏宗祠」（即大祠堂）。另一處是位於觀星臺後面的「王文成祠」，文成公在世時曾立為陽明書院，而在此之前則為海日公居越後的最早故居，故所謂「龍山里第」（頁1400），最初指的就是這處樓居。再一處是座落於光相橋西側的三所「大臺門」，即按海日公及第為官之過程而命名的，分別為守儉（微節公）、守文（顯玉公）、守章（西青公）三子建造的「學士第」、「翰林第」和「狀元第」（我小時候這些房子都已賣給他姓）。因文成公是長子，故居於其父住宅宮保第。宮保第始建於成化十七年（1481），是年海日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任職京師。正德十六年十二月（1521），文成公詔封新建伯，才有宮保第擴建為伯府第之舉。可惜的是，一九二四年正月十九日下午，伯府第失火，整個大廳及東首兩幢房屋被毀。當時住在府內的堂兄弟三家，除大房外，二、三房兩家全部燒燼。

錢案：據我所知，王詩棠所講的伯府宅第問題是迄今為止內容最詳實的。諸煥燦曾以陸深〈海日先生行狀〉中的「龍山里第」為據，斷定：「龍山即餘姚城

內之山，山正對瑞雲樓正門，約近百米而已。正德壬申〔……〕陽明四十一歲。此年王陽明復官京師，王華已於早年致仕居家。陸深以『使事之餘』拜訪先生王華於『龍山里第』，說明至少在正德七年時，王陽明一家仍居住餘姚城內，只是由瑞雲樓搬到『龍山里第』而已。」甚至認為，至少在正德十四年或十六年時，陽明一家仍居姚城^⑧。其實紹興城內也有「龍山」，又稱「臥龍山」^⑨，正對光相坊幾百公尺。而且陸深的完整記述應是：「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頁1400）南鎮即會稽山^⑩，陽明洞天則在會稽諸山宛委山龍瑞宮西側。很明顯，陸深此處指的是紹興「龍山」，而「里第」亦當為越城王華故里。另據陽明正德七年〈上大人書〉載：「聞餘姚居址亦已分析各人管理，不致荒廢，此亦了當一事。」（頁1209）說明至少在正德七年陽明一家已遷居紹興。其實，陽明一家究竟何時遷至山陰，在目前材料尚不充分的情況下，還是存疑為妥。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一下，不少人以為「伯府毀於太平天國兵燹」^⑪，而王詩棠則多次提出疑義，說是記得很清楚，八歲那年正月點蠟燭，因大廳內堆放著各家柴火，引起火事而被毀。我想，以伯府當時之規模，恐非一次火災或兵燹就能毀掉的。兩說時間相差半個多世紀，正好說明伯府在進入近代以後的被毀過程和歷史滄桑。現伯府第舊址僅遺存石碑坊和飲酒亭（又稱王家臺門）。

錢問：據《年譜》記載，王華夫婦都葬在紹興，但後人對其墓葬情況並太不清楚。而陽明墓自一九八九年修復以後，才為世人所了解。您能介紹一下祖塋之情況嗎？

⑧ 參見〈姚江王氏、遷居紹興、爭嗣爵位三考〉。

⑨ 臥龍山在紹興城西北部，因山勢若臥龍而得名。越大夫文種葬於此，故又稱種山。後以府衙設於其東麓，易名府山。民間又叫龍山，參見陳橋驛：《紹興地方文獻考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07。陽明及其門人亦稱餘姚「龍山」為「臥龍」（頁224），或稱「龍泉山」（頁672），三者合計在《全集》裏有十數次之多。而明確指稱紹興龍山或臥龍的只有三處，即頁255的「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和頁1332的「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再就是所謂的「龍山里第」了。

⑩ 一說南鎮指南鎮廟或南鎮祠，故《康熙會稽縣志·會稽山圖》將「南鎮」標在禹陵北側。但從《傳習錄》所載陽明遊南鎮「觀岩中花樹」（頁107）及陸深所謂「遊南鎮諸山」來看，南鎮當指會稽山。

⑪ 《紹興市誌》第4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王答：海日公墓在越城南門外南池鄉百家岙村天柱峰背的茅山南麓半腰處，座北朝南，全墓石條砌築，分上中下四層，順依山勢，逐級升高；但如今只剩兩層，不見甬道，且損毀嚴重，破殘不堪。鄭太夫人（陽明生母）初葬於餘姚穴湖山，後遷至山陰縣南的石泉山。海日公去世時，原擬與鄭太夫人合葬於石泉山，但打開墓一看，已是水滿為患，不得已才另擇茅山，而把鄭太夫人遷葬於鑒湖北岸的徐山村。文成公四弟守章的墓在西埠老鼠山南麓，墓身不大，設有墓碑和祭臺。聽長輩說，在文成公墓地鮮蝦山後面的東北方向還有一處祖塋，說是文成公之子正憲或者正億的，因山高難行，只好每年清明祭掃文成公墓時，向東北遙祭。此外，在水偏門的護城河對岸可望見一座石傭墳頭，說是文成公之孫墓；而出水偏門沿城河南行，在望仙橋東邊山腳，又有一座「衣冠墳頭」，無墓碑祭桌，說是文成公會孫墓。至於文成公墓，我想多說幾句。該墓自建立以來，至今已歷時四百七十年整，其間歷經磨難，數度修復，較大的工程就有五次：一是嘉靖八年（1530）十一月，門人故舊出資建墓，初葬陽明，墓身雖簡樸，但環境清幽；二是隆慶元年（1567）五月，穆宗下詔欽賜建墓，在原址拓建，全墓分上下四層，石條砌築，華表墓道，栽植松柏。三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紹興知府俞大猷得知墓為土人所占，侵削殆盡，特督辦修復，並「盡歸所占於王氏，俾世守之」；四是一九三七年，駐紮紹興的二十八軍軍長陶廣動兵整修墓道，並署名立碑，以勵後世。六十年代初，我外甥下放花街時還見墓道條石基本完好。五是一九八九年，紹興縣政府撥款，日本友人資助，對墓身進行大修，並開拓墓道，擴大臺基，增設祭臺，使全墓更為肅穆莊嚴。該墓現已立為省級文保單位。

錢案：關於陽明墓葬，餘姚、紹興文管部門的專家已作過詳考，可參見葉樹望的〈王陽明墓地考〉（《餘姚市名城名賢論文集》一九九七年第三輯）、傅振照的〈王守仁墓葬考〉（《王陽明哲學思想通論》）和梁志明的〈紹興王陽明墓地剖析〉（未刊）。但三位對陽明墓在嘉隆年間的初建擴建過程，或未作詳述，或言之有誤。其實《年譜》已說得很清楚：陽明歿後，因「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偽學」（頁1325），故其喪葬只能由門生故舊齎資相助，而且墳墓也十分簡樸，僅由李珙等築治「月餘」（頁1327）就建成了。三十七年後，陽明被平反昭雪，穆宗下詔「遣行人司行人賜造墳域」（頁1354），墓道才得以按品級規定拓展重建。以後歷次修復，均以此為基礎。

至於王華夫婦的墓地，傅氏、梁氏皆據《嘉慶山陰縣志》「吏部尚書王華墓在

徐山碣」之記載，認定兩人合葬在位於天柱峰背茅山的徐山。然《年譜》則云：「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峰、鄭太夫人於徐山」（頁1289）；後陽明夫人諸氏卒，亦「祔葬於徐山」（頁1293）。天柱峰又名望秦山，在秦望山北側，《康熙會稽縣志·鑒湖圖》裏作「天柱山」。茅山即會稽山。《水經注》云：「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又名棟山。」在地理概念上天柱峰屬會稽山脈，而在文化概念上二者又各有所指。明清志圖大都以文化概念為基礎，故不應把天柱峰與茅山相混淆。徐山是指灘渚江下游西岸的徐山村^⑫，與天柱峰相距十數里，非真謂山巒也。可見《年譜》及王詩棠所述不誤。

錢問：據載，陽明的喪葬儀式聲勢浩大，「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頁1327）。以後年年祭掃，歷久不衰。您能談談山陰王氏後裔祭祖活動的一些情況嗎？

王答：在我的記憶中，我陽明後裔的祭祖活動，除四時八節和祖宗生諱忌日在祠堂舉行外，每年有三次，即新春拜墳、清明掃墓和冬至問寒，而且每次都要坐船上墳祭掃。正月初四、初五是拜墳歲，十月初一、初二是送寒衣，清明則要連續掃墓五天。祭掃活動都是男丁出場，婦女不參加，並規定男孩六歲進祠堂，八歲才能上墳船。掃墓的先後次序為：茅山海日公墓、徐山鄭太夫人墓、花街文成公墓，以及文成公子孫們的一些墳墓（但具體名氏不清，有待查考）。記得上文成公墓時，祭品中除一般共有的食物外，還特別加上一盅青螺，是用海螺的肉烘乾而成，說是避「瘴氣」的。小時候我每年都要隨大人來上墳，直至離家參加工作。去年正月初七，我終於帶二子來此上了趟祖墳，看到由於種種原因而幾十年不能祭掃的先祖之墓，如今已舊貌變新顏，真是百感交集，止不住熱淚盈眶。

錢案：據我所知，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政治氣候的改變，海內外人士至少已在陽明墓舉行過三次大型的祭掃活動：一是一九八六年八月以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岡田武彥為首的王陽明遺跡考察團與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行的祭掃儀式；二是一九八九年四月王陽明墓修復落成典禮暨紀念王陽明逝世四百六十周年祭掃活動；三是一九九九年四月紀念王陽明逝世四百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及掃墓儀式。此外，中日兩國人士還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在江西大餘縣青龍鋪舉行過「王陽明落星之地」紀念碑的落成典禮和祭掃活動。

錢問：最後想再問兩個與您家世不太有關的話題。在採訪中曾聽您談及過「天

^⑫ 參見周幼濤：《紹興山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頁54。

泉橋」，可是我查閱了萬曆、康熙《紹興府志》和康熙《山陰縣志》以及萬曆《會稽縣志》等資料，均未有「天泉橋」之記載。前些年傅振照曾作過考證，認為「天泉橋是伯府內花園內碧霞池上的一座庭院橋」^⑬。因陽明晚年思想集中體現在「天泉證道」上，且由於對其中的「四句教」理解不同而產生了王門著名的「四無」、「四有」說，從而直接導致了王學的分化。所以「天泉橋」這個地名，在陽明學中猶如朱子學中的「鵝湖」。您認為「天泉橋」應在何處？傅氏的說法是否有道理？另外，關於紹興「陽明洞」您是否聽長輩說過或親眼見過？

王答：我從小就在光相坊這塊地方長大，對這一帶的路名橋名很熟悉，但從未聽說過「天泉橋」。過去我曾認為天泉橋就是現在的北海橋。因為後者就位於伯府第後院牆外，從府第後院「觀星臺」（形如假山，故世稱「王假山」）旁，沿假山弄出後門，向北走二、三十步就是了，因而在夜裏「移席天泉橋上」（頁 1306）是可能的。最近作了更正，基本同意傅氏的看法，但須作兩點補充：其一，小時候我所見過的碧霞池要比如今大得多，後因池邊住家移牆拓院及建路等原因，使池子面積逐漸縮小；若要在今天的碧霞池上建橋是難以置信的。其二，聽長輩們說，過去每逢中秋時節，都要在碧霞池上搭臺設樓，以便夜晚暢飲歡歌。所謂天泉橋，或許指的就是這臨時搭在伯府內碧霞池上的樓臺，因不屬官府或民間造的交通橋，故史志不載。陽明洞我只聽說在城東南的宛委山。

錢案：王詩棠的天泉橋說與傅氏所說可謂相得益彰。就此我想再提幾條，以為佐證：第一，據嘉慶《山陰縣志拾零鈔》載，碧霞池上曾有「一泓天泉，縈繞四壁」，天泉橋之命名大概與此天泉有關；第二，《年譜》提到天泉橋處亦涉及碧霞池，如嘉靖三年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中秋月白如畫，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頁 1290、1291）；第三，《全集》中凡提到天泉橋的時間都在中秋季節，即八、九月間，且都與歡宴吟詩相關；第四，〈居越詩〉裏有一處記載（頁 790），似為「天泉橋」又名「天泉樓」之證據。這些都可印證王詩棠的上述觀點。現今，碧霞池被叫作「王衙池」，府第內居民被稱為「王衙弄」，而觀星臺則於一九八八年由港胞投資闢為「月明園」；登高望遠，與龍山呼應。

至於「陽明洞」，在王陽明的講學軍旅生涯中共留下三處遺址：一是紹興「陽明洞」，又稱「陽明洞天」（頁 1400）或「陽明山」（頁 162）；二是貴州修文

^⑬ 〈王陽明「天泉證道」新探〉，載《越文化研究通信》1998 年第 9 期。

原名「東洞」的「陽明小洞天」（頁 695）；三是江西龍南原名「玉石岩雙洞」的「陽明別洞」（頁 751）。後兩者遺址尚存，記載無誤。但前者則分歧較大，有說在會稽山的（毛奇齡：《王文成傳本》），也有說在四明山的（墨憨齋：《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兩山當時雖都在紹興境內，然相距二百餘里。後經陳來詳考，證實洞在會稽山。據萬曆《紹興府志》載：「會稽山陽明洞在宛委山，洞是一巨石，中有罅，長亙龍瑞宮旁，舊經道家之第十一洞天也。〔……〕蓋會稽諸山之總名，不獨此石罅也。〔……〕洞或稱禹穴。」既然不可真謂「洞穴」，故史書中要麼說築室「陽明洞天之下」（頁 1400），要麼便直呼「陽明洞」或「陽明山」，而少有稱「陽明洞中」的（頁 1225）。現存洞址與府志所言完全相符。最近紹興市已決定投巨資，在原址興建陽明洞天工程，包括陽明書屋、陽明紀念館和陽明廣場等項目，以再顯當年之靈氣。